

流動兒童智能手機使用的父母媒介干預： 基於家長視角的混合研究

黃丹* 羅英廷**

摘 要

通過混合研究方法，本研究旨在探索中國大陸的流動家長對孩子的智能手機使用的媒介干預經驗。研究表明：儘管流動家長們意識到了智能手機可能給兒童帶來的益處，但他們更加擔心手機使用會對孩子和家庭帶來的負面影響。流動家長更傾向使用限制型和監督型媒介干預策略，但僅有積極型干預策略能有效降低流動兒童的手機使用時數。除此之外，流動兒童的年級、孩子放學後是否有照顧者、親子關係亦是影響流動兒童手機使用時數的重要影響因素。最後，討論了以上發現對社會工作專業實踐的啟示。

關鍵詞：父母媒介干預，智能手機使用，流動兒童，混合研究方法

* 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華南師範大學（中國）

** 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華南師範大學（中國）

Parental medi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s smartphone use: A mixed method study based on the parents' perspective

Dan Huang* Yingting Luo**

Abstract

Through the mixed research method, this study explores parental mediation of smartphone use by rural-to-urban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lthough migrant parents are aware of the benefits of smartphone use to their children, they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negative impact that smartphone use may have on children and families. Migrant parents are more inclined to use restrictive and monitoring media mediation strategies, but only activ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smartphone usage hours of migrant children. In addition, the grade level of migrant children, whether they have caregivers after school,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re also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number of smartphone usage hours of migrant children.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are subsequently discussed.

Keywords: parental mediation, smartphone use, migrant children, qualitative method

*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研究背景

父母媒介干預(Parental Mediation) 是指父母為了發揮媒介的積極作用，避免媒介對兒童的消極影響而主動採取的措施，是父母對兒童所接觸的媒介及內容進行控制、監督和解釋的所有干預(Warren, 2001)。大量學者圍繞電視、電影、遊戲機和網路等媒體相關的父母媒介干預行為展開了社會調查研究和實驗研究，證實了父母媒介干預對兒童的媒介態度、行為及社會化產生了顯著影響(Chang et al., 2019; Lee & Chae, 2012)。然而，智能手機使用具備的私密性特徵，給父母媒介干預帶來挑戰。與此同時，作為“網路原住民”的一代，孩子們在使用網路媒體方面無師自通，父母甚至要依靠孩子學習相關技術，而這種知識的缺乏限制了父母對青少年智能手機使用的媒介干預。因此，如何教育孩子正確地使用智能手機是當代父母們面臨的普遍挑戰。

中國大陸流動兒童的智能手機成癮已經成為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社會問題。流動兒童是指年齡在0到17歲、離開戶籍所在地而前往父母打工地的個體(Lu et al., 2016)。2020年，中國流動兒童已經達到1429.73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21)。初到城市的流動兒童面臨著與老家的朋友分離、適應新環境、與父母的建立情感聯繫等困境(Lu et al., 2016)，而一些流動兒童則難以與城市中的父母和同齡人建立情感聯繫(王倩 & 李穎異，2018)。上述因素可能使流動兒童感到沮喪。然而，網路的虛擬性使他們可以逃避現實並尋求受挫後的安慰(Kardefelt-Winther, 2015)。由於流動兒童最常用的上網工具是手機，所以他們更易沉迷於手機。並且，流動兒童在城市生活時會遇到一系列的社會排斥，這可能會讓他們產生社交焦慮，而手機成為了他們進行社交的重要媒介，從而導致了手機成癮(麻書滔等，2022)。

然而，流動兒童家長們由於在城市的生存壓力，很難在孩子的手機使用過程中給予足夠有效地指導。流動家長對子女就媒介問題相關的交流互動時間與頻率都低於非流動兒童父母，在處理對兒童不宜的媒介內容時也表現出了更消極的態度(王倩 & 李穎異，2018)。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流動家長們實施父母媒介干預時面臨更大的困難。疫情期間學校關閉，並採取了線上教學的方式，這使得兒童不得不使用移動設備進行線上學習。一項對147名困境流動兒童的調查顯示，因為無法購置電腦和無線網路，許多流動兒童使用父母的手機上網課，而這讓一些家長因孩子過度使用智能手機而感到焦慮(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2022)。

社會工作者需要幫助流動父母有效地干預孩子的智能手機使用，防止孩子手機成癮。然而，關於父母媒介干預對流動兒童手機使用的研究非常有限，對於如何提供服務來滿足流動家庭的需求知之甚少。本研究旨在通過探索父母對流動兒童

使用智能手機的經驗來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為流動人口的社會工作實踐提供證據。

文獻回顧

對於兒童使用智能手機的父母媒介干預，學者們更多地關注限制型干預、積極干預和監控三種父母媒介干預策略(Hefner et al., 2019)：(1)限制型干預包括一般限制和特殊內容限制。一般限制要求父母嚴格控制孩子的日常媒體使用，如使用時間(Benedetto & Ingrassia, 2021)。特定內容的限制是指父母禁止孩子觀看某些內容(Nikken & Jansz, 2014)或安裝過濾軟體來限制他們訪問某些網站(Lee & Chae, 2012)；限制型干預是兒童互聯網和移動設備使用中最常見的父母媒介干預策略(Chou & Chou, 2019)；(2)積極型干預是指父母通過解釋和討論等互動形式來指導孩子使用媒體(Nikken & Jansz, 2014)。(3)監控型干預包括父母檢查孩子的移動設備，以跟蹤他們的線上活動(Chang et al., 2019)。一些父母根據孩子的特點，如年齡和感知成熟度，混合使用不同的父母媒介干預策略(Bartau-Rojas et al., 2018)。現有的關於兒童手機使用的父母媒介干預研究大多採用定量研究方法來探索上述三種策略的效果(Chou & Chou, 2019)。

現有研究一致認為，積極干預可以通過直接和間接的方式減少兒童的手機成癮傾向(陳豔等, 2021; Fu et al., 2020)。但是對於限制型干預和父母監控在青少年智能手機使用中的效果卻存在較大的爭議：一是在限制型干預方面，一些研究認為限制型干預可以降低兒童的手機成癮程度(Hefner et al., 2019)，並且這種效果會通過青少年的自我情緒調節和自我行為調節能力得到加強(Meeus et al., 2019)。另外一些研究則認為父母因缺乏共同的理解能力、技術能力和干預經驗，導致在實施限制型干預時經常發生親子衝突，而這種衝突會增加孩子的心理壓力，導致孩子更依賴手機(Ko et al., 2015)。還有一些研究認為父母的限制型指令如果與孩子使用智能手機的使用目的無關，那麼父母的干預就可能會被忽略，而達不到干預效果(Chuo & Chuo, 2019)。二是在父母監控方面，第一種觀點認為隨著父母監控力度增加，易引發親子衝突，導致兒童手機使用行為增加；如果父母在監控過程中自己低頭看手機，則會加重兒童的手機成癮行為(Fu et al., 2020)。第二種觀點則認為父母通過查看孩子使用手機記錄等方式實施的監控在減少兒童手機成癮的效果較差(Hefner et al., 2019)。綜上所述，不同的父母媒介干預策略是否能夠對孩子的智能手機使用行為產生效果，還可能受到一些其他重要的因素影響，比如孩子的年級、親子關係等。

現有研究表明，來自弱勢社會經濟背景的父母可能容易在實施父母媒介干預時

無法達到預期的結果。例如，高收入父母傾向於採取積極干預(Top, 2016)，這已被證明具有較好的效果。另一項研究顯示，教育水準較高的父母能全面且批判性看待智能手機的使用，並採取多種干預策略來引導孩子正向使用手機，而教育水準較低的父母則認為智能手機使用對兒童有害，大多採取限制型干預(黎黎& 劉滔, 2023)。然而，簡單粗暴的限制型干預可能引發親子衝突，損害親子關係，增加兒童的心理壓力，進一步加劇他們對智能手機的依賴(Fu et al., 2020)。因此，收入低、教育水準低的流動父母可能比非流動父母在實施父母媒介干預時更具挑戰性。

綜上所述，父母的手機干預策略類型與效果受孩子性別、年齡、父母的教育水準、親子關係等因素的影響。諸多因素在經濟和文化差異的背景下，可能導致流動兒童的家庭在兒童智能手機使用議題上的媒介干預策略和效果與非流動家庭存在區別，亟待進一步探索。因此，本研究旨在從家長的視角，來探索以下的研究問題：第一，流動家長對孩子使用智能手機的看法和擔憂是甚麼？第二，哪種類型的父母媒介干預策略可能降低流動兒童的手機使用時數？

研究方法

1. 招募研究對象

我們與三家服務流動人口的廣州市社會工作機構合作，通過向四所學校發送問卷調查，並通過線上報名的方式來招募被訪者。這四所學校包括兩所初中和兩所小學，每所學校的流動兒童人數都超過了50%。最後，一共有65名家長填寫了問卷，剔除了一份無效問卷共獲得64份問卷調查數據。在64名被調查者中，母親占65.6%，父母的平均年齡為30.64歲(SD=8.427)，68.8%的父母已婚，他們的孩子76.5%在讀小學，詳情見表1 所示。我們逐一對接收問卷調查的家長進行了電話訪談，並按照標準進行再次篩選。在排除了無法聯繫到、沒有時間接受訪談的父母後，我們最終招募了16名流動家長自願參與訪談。所有流動家長均為自願參與我們的問卷調查，在訪談前徵求了所有被訪者的口頭知情同意，並告知被訪者他們的資訊會被保密及匿名處理。被訪者的社會人口背景資訊請見表2。

表1 問卷調查樣本特徵

樣本要素	樣本構成	人數	百分比	樣本要素	樣本構成	人數	百分比
父母的性別	男	22	34.4%	孩子的年級	小學	49	76.5%
	女	42	65.6%		中學	15	23.5%

父母受教育程度	未受過任何教育	1	1.6%	婚姻狀況	未婚	16	25%
	小學	0	0%		已婚	44	68.8%
	初中	14	21.9%		離婚	3	4.7%
	高中/中專/技校/職高	18	28.1%		喪偶	1	1.6%
	專科	6	9.4%				
	本科	24	37.5%				
	研究生及以上	1	1.6%				

表2 被訪者的特徵

編號	年齡	性別	婚姻狀況	教育水準	孩子數量	編號	年齡	性別	婚姻狀況	教育水準	孩子數量
P01	30	男	離婚	大專	1	P09	38	女	已婚	初中	2
P02	35	女	已婚	初中	1	P10	37	男	已婚	初中	3
P03	43	女	已婚	初中	2	P11	52	女	已婚	小學	3
P04	40	男	已婚	初中	3	P12	37	男	已婚	初中	2
P05	41	女	已婚	大專	3	P13	50	女	已婚	初中	3
P06	54	男	已婚	小學	3	P14	36	女	已婚	小學	2
P07	42	女	已婚	初中	2	P15	40	女	已婚	小學	4
P08	42	男	離婚	初中	1	P16	42	女	已婚	初中	2

2. 數據收集

研究於2021年12月至2022年3月期間進行，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研究通過線上問卷和電訪的形式展開。問卷數據我們主要調查了流動家長及其孩子的社會人口背景資訊、父母對孩子手機使用的態度，父母觀測到的流動兒童手機使用時數、親子關係以及媒介干預策略等。在本研究中，我們使用了具有較高信效度的標準量表來對以上變量進行評測。

訪談部分則主要包括以下的訪談問題：“請告訴我您孩子使用智能手機的情況”、“您認為您孩子使用智能手機的情況如何？”你對孩子使用智能手機有什麼擔心嗎？你是如何干預孩子使用智能手機的？”以及“你認為家長可以通過什麼方式預防孩子過度使用手機？”還有其他資源可以幫助你嗎？”此外，被訪者介紹的主題也得到了關注和討論。

3. 數據分析

對問卷調查收集的資料，我們採用了軟體SPSS22.0進行分析。首先，通過描述性分析展現了研究對象的基本情況；其次，通過皮爾森相關性分析，檢驗了父母和孩子的基本人口特徵、放學後是否有人照顧、親子關係和父母幹預策略之間的相關性；最後，通過逐步多元線性回歸，探討了父母的媒介幹預策略對流動兒童智能手機使用時數的幹預效果。

訪談得到的質性研究數據則使用了主題分析來分析。我們對錄音進行了完整的轉錄並核查了謄寫稿，以保證轉錄時保留了原始錄音中所表達的含義。我們對每一份轉錄稿進行了獨立編碼，並對所有謄寫稿進行了兩次編碼。隨後，我們演繹地生成了初始主題。接下來，我們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檢查編碼和相關資料是否與主題匹配。為提高研究結果的可靠性，研究者在整個數據分析過程中舉行了多次會議來進行了反思性對話，並與合作的社會工作者進行交流並聽取他們對編碼的意見。

研究發現

1. 流動家長更關注孩子使用智能手機的危害

接收訪談的家長認為流動兒童的智能手機使用具有兩面性。他們認為智能手機作為集工作、學習和娛樂等功能為一體的電子產品，如果兒童可以對手機進行適當的使用，有助於孩子學習知識、提高語言能力、培養興趣、放鬆身心和獲取快樂感及刺激感。與此同時，手機在流動兒童家庭中也具有實際的功能，如幫助父母陪伴孩子、定位孩子的地理位置、保持與孩子的聯繫、上網找資料來協助孩子完成家庭作業等。但是，相較以上所說的益處，家長們普遍更加關注智能手機使用可能給孩子自身以及整個家庭所帶來的危害。本研究的問卷調查發現，有70.3%的流動父母覺得孩子使用智能手機的行為不合適，76.6%的流動父母不滿意孩子現在的智能手機使用行為。

1.1 對流動兒童自身危害的擔憂

所有被訪者都表達了他們對孩子使用智能手機的擔憂。被訪者認為玩手機會影響兒童的身體健康。例如，一名被訪者抱怨說，他兒子過度使用智能手機影響了他的視力。

共有七名被訪者擔心使用智能手機會對孩子的學習成績帶來負面影響，其中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學習成績下降。這種影響還表現在孩子因為玩手機而在學習方面漫

不經心。一位被訪者擔心，手機強大的檢索功能使兒童能夠輕鬆地從網路上找到作業的答案：“現在手機上有一個專門的APP，你可以拍下不會的題目，上面就會顯示出答案。我百分之百確定我女兒經常在手機上找答案，基本上自己不動腦子。”

父母們還擔憂手機上的一些視頻的不良示範使得孩子們習得不良行為。他們認為網路上的資訊錯綜複雜，良莠不分，而孩子們由於年幼缺乏足夠的判斷力而全盤接收，進而習得不良行為。比如，在訪談中有兩個家長表示孩子由於打手機遊戲而習得爆粗口，並將其認為是一種風尚。

一些被訪者認為，長時間玩手機會減少兒童的社交，使得孩子變得孤僻，並且對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邊界模糊不清。另外還有一些父母有洞見地看到長時間使用手機對孩子時間的浪費，進而失去“成長的機會”。他們認為過度使用手機，不僅會給孩子帶來即時性傷害，並且負面影響是具有延續性的。

1.2 對流動兒童家庭危害的擔憂

流動家長也關注到孩子對手機不合適的使用行為給家庭帶來的負面影響。這種影響表現在親子溝通減少、家庭成員關係惡化和財務損失三個方面。一些被訪者認為，孩子使用智能手機會減少親子溝通的時間。一位母親的話印證了這一點：“他玩手机就沒時間跟我們溝通了，他玩手机的時候聽不到你說話，也不喜歡和你說話”。此外，孩子使用智能手機也可能會引發家庭成員間的衝突。例如孩子玩手机時，因為爭搶對手機的優先使用權，會常常引發兄弟姐妹之間的衝突。同時，流動父母因為對孩子使用手機持不同的意見而引發夫妻衝突，正如一位母親而言：他爸爸經常把自己的手機給孩子玩，我天天為這個事情跟他爸爸吵架。”

有兩位被訪者認為，孩子不當的手機使用也會造成家庭的財務損失。當孩子們使用父母的手機時，他們可能會由於玩手机遊戲充值、買遊戲皮膚，或者看網路直播給主播打賞等而使用父母的支付寶或微信進行相應的手機支付。

2. 流動家長的父母媒介干預策略及其效果

2.1 父母媒介干預策略

流動父母擔心兒童使用手機會對自身和家庭都帶來諸多不利影響。因此，被訪者試圖通過採用不同的干預策略來改正孩子的手機使用行為。與現有文獻一致，流動家長們也主要採用限制型、監控型以及積極型干預策略。

2.1.1 限制型干預

限制型干預包括時間限制型干預和特殊內容限制型干預。流動父母們最常使用的干預方法是限制孩子們的手機使用時間。11名被訪者口頭與孩子約定手機使用時間。三位被訪者通過禁止孩子玩手機遊戲的方式進行了干預。只有一位父母在手機上開啟了兒童使用模式，對使用時間進行了技術限制，而其他被訪者不知道或沒有使用該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當父母的時間限制干預達不到有效控制孩子玩手機的效果時，有五位被訪者採取了粗暴的方法沒收手機。當雙方發生爭執時父母甚至會打孩子。此外，父母們並不認為這樣的粗暴教育是對孩子身體上的一種虐待，而認為是一種必要的父母教養方式。

2.1.2 監控型干預

四名被訪者會通過翻看孩子的手機的聊天消息和消費記錄等方式瞭解孩子玩的內容。父母的監控行為會引起流動兒童的反抗，而父母們通過對手機所有權的宣告來證明自己查看孩子手機記錄的正當性。此外，有三位父母並不認為查看孩子的資訊是在觸犯孩子的隱私，他們認為自己作為孩子的保護者，理應對孩子的一切知情。例如，一名家長說到“我會翻看我兒子的QQ和微信記錄。在他成年之前，我有權瞭解他的一切。”

2.1.3 積極型干預

只有三名被訪者使用了積極干預的策略。他們認為手機具有兩面性，父母要教孩子去辨別手機上面的資訊，學習好的內容並識別壞的內容。一些父母主動選擇一些教育性的視頻來與孩子一起觀看，一邊看一邊與孩子討論其中的內容。有時候父母會詢問孩子的看法來幫助他們明辨是非。

2.2 不同的父母媒介干預策略效果

根據表3分析結果顯示，流動父母的年齡和流動兒童的年級與兒童的智能手機使用時數正相關，放學後是否有人照顧與流動兒童的智能手機使用時數正相關。親子關係、積極干預和流動兒童的智能手機使用時數呈負相關。

表3 相關性分析結果 (n=64)

	1	2	3	4	5	6	7
1.父母的年齡	1						
2.孩子的年級	.427**	1					
3.放學後是否有人照顧	.068	.257*	1				
4.親子關係	-.091	-.022	-.134	1			
5.限制型幹預	-.177	.070	-.258**	.414**	1		
6.監控型幹預	-.142	.152	.132	.090	.258*	1	
7.積極型幹預	-.350**	-.038	.038	.563**	.459**	.367**	1
8.流動兒童手機使用時數	.181*	.307*	.301*	-.255*	-.134	-.065	-.338*

注：括弧外為標準化回歸係數，括弧內為標準誤差；* $p < 0.05$ ，** $p < 0.01$

基於相關性分析結果，我們將流動父母的年齡和流動兒童的年級作為控制變量，逐步將放學後是否有人照顧、親子關係和父母媒介幹預策略納入模型中，對孩子的智慧手機使用時數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見表4所示。

表4 流動兒童手機使用時數影響因素回歸模型分析 (n=64)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父母的年齡	.008(0.953)	.019(0.891)	-.007(0.961)	-.128(0.384)
孩子的年級	.313*(0.031)	.256(0.084)	.270(0.062)	.291*(0.049)
放學後是否有人照顧		.193(0.148)	.153(0.242)	.225(0.105)
親子關係			-.252*(.049)	-.071(0.643)
限制型幹預				.085(0.570)
監控型干預				-.034(0.803)
積極型幹預				-.384*(0.031)
R2	0.100	0.135	0.196	0.280
D-W	1.837	1.880	1.944	1.906

注：括弧外為標準化回歸係數，括弧內為標準誤差；* $p < 0.05$ ，** $p < 0.01$

在四個模型中，所有變數的VIF值最高為2.065，均小於5；D-W值均小於2，說明這四個模型內部的多重共線性較弱，不存在自相關性。在模型1中，父母的年齡和孩子年級可解釋流動兒童智能手機使用時數得分變異的10%。模型2中加入“放學後是否有人照顧”后可解釋流動兒童智能手機使用時數得分變異的13.5%。模型3中加入“親子關係”後可解釋流動兒童智能手機使用時數得分變異的19.6%。親子關係對流動兒童智能手機使用的時數有顯著負向影響。模型4中加入“父母媒介幹預策略”後可解釋流動兒童智能手機使用時數得分變異的28%。總的來說，這個模型是顯著的， $F(7,50)=2.776$ ， $p < 0.05$ ， $R^2=0.28$ 。在控制父母的年齡和孩子的年級後，積極幹

預的顯著水準達到了 $p < 0.05$ 。由此可見父母的積極幹預可有效降低流動兒童的智能手機使用時數。

討論

本研究中的流動父母更關注兒童使用智能手機帶來的負面影響。他們普遍認為，使用智能手機會對孩子產生不利影響，如給身體帶來傷害、學習成績惡化、產生不良行為以及人際交往減少。此外，一些被訪者認為，過度使用智能手機會讓孩子失去與現實的聯繫，錯過成長的機會。同時，流動父母也認為，孩子使用智能手機會減少親子溝通時間、惡化家庭關係和損害家庭財務。

為了避免孩子因過度使用智能手機而產生不利影響，本研究中的流動父母採用了現有研究中提到的限制型干預、監控和積極干預的策略。與現有研究類似，本研究中的大多數流動父母使用了限制型干預(Chou & Chou, 2019; De Morentin et al., 2014)。這可能是因為，認為媒體對孩子有負面影響的父母更有可能採取限制型干預(Lee & Chae, 2012)。現有研究表明，收入較高的中產階級家庭的父母在父母媒介干預中傾向於採取積極干預，強調協商合作，並注重減少兒童對媒體的依賴(Top, 2016)。但是，本研究中的大多數參與訪談的流動父母試圖通過限制使用手機的時間和內容來減少手機對孩子的負面影響，只有一位被訪的父親使用了技術限制，這可能是受該群體教育水準低、數字素養低和空閒時間少的多重限制所致。然而，流動家長的限制型干預似乎無法有效控制兒童的智能手機使用行為，很可能會引發親子衝突(Fu et al., 2020)。並且，本研究量化的數據也顯示，在流動家長們所使用的三種媒介干預策略中，僅有積極干預策略能夠有效減少流動兒童的手機使用時數。因此，本文的研究結果強調了提高流動父母的數字素養和學習積極媒介干預策略的重要性。並且，本研究還揭示了流動兒童的年級、孩子放學後是否有照顧者、親子關係亦是影響流動兒童手機使用時數的重要影響因素。

有效地控制流動兒童對智能手機的使用已經成為了父母的一大難題。沉迷手機表面上看似只是流動兒童的不良行為，但其實是流動兒童孤獨、壓抑、無助的現實表現。流動給兒童的生活帶來了較大的轉變，他們不得不重新適應新的環境、面對多重的挑戰。最直觀的體現是流動兒童社交網路的缺失：一方面與老家的朋友分離；另一方面，他們普遍居住在城中村或城鄉結合部的出租房裏，使他們與城市的朋輩在地理上的區隔。周圍都是不認識的人，而手機成為了他們與朋友跨越地理障礙保持聯繫的重要工具。很多流動兒童的生活軌跡僅限於家校兩點一線之間，且所處周圍環境中少有兒童娛樂設施，孩子除了學習，只能玩手機消遣時光。而流動父母因文化程度較低、工作繁忙，所以在實施父母媒介干預時受到缺乏時間和教養技巧的限制。

基於本研究的發現，我們對社會工作者的干預有以下介入建議：首先，社會工作者需要協助流動家長認識到父母媒介干預的內核是關心、陪伴和愛護，並建議父母採取詢問和自主准予等民主型干預形式，以及更多地使用積極型的媒介干預策略；其次，社會工作者可以舉辦數字素養工作坊，幫助流動父母加強對媒體使用的理解，提高他們的媒體使用技能，縮小與孩子的數字差距，並規範孩子的智能手機使用行為；第三，組織親子活動，促進親子互動及親子溝通，改善親子關係，營造良好的家庭氛圍，也有利於有效媒介干預的實施；第四，提供足夠的社區服務也可以幫助流動父母更好的控制孩子對手機的使用。社工可以招募志願者來為流動兒童提供課業輔導及開展社區興趣活動，豐富流動兒童的生活，緩解流動兒童獨自一人在家，無人照顧的困境。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本研究僅收集了64份問卷調查及訪談了16位流動兒童的父母，這限制了研究結果的推廣。未來的研究需要增加樣本量以增強其推廣性。其次，本研究僅從父母的視角探討了流動兒童使用手機的情況，而流動兒童本身作為手機的直接使用者，並未納入本次研究。未來的研究應該將流動兒童納入到研究對象中，從親子的視角去進行配對性分析。

致謝

感謝2021年度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專案(一般專案)“青少年手機依賴的多家庭小組工作干預研究”(編號:GD21CSH01)及2020年度廣東省教育科學“十三五”規劃專案(德育專項)“基於家庭的團體干預模式在青少年手機依賴中的應用”(編號:2020JKDY017)對本研究的資助。感謝支持我們本項研究開展的社會工作機構及參與研究的所有流動家長。

參考文獻

黎黎 & 劉滔 (2023)。父母干預與農村中小學生的智能手機使用--基於社會認知理論的影響因素研究。《少年兒童研究》(2), 15-24。

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 (2022)。協作者研究:保護疫情下的童年——基於“協作者”困境流動兒童需求評估的發現和建議。 <http://www.facilitator.org.cn/news/aboutus01/news-id/1148/>

麻書滔, 李婷 & 麻彥坤 (2022)。歧視知覺對流動兒童手機成癮的影響:一項追蹤研究。《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 30(6), 1313-1317。

陳豔, 陳紅 & 穀傳華 (2021)。父母干預與青少年手機成癮的關係:一項追蹤研究[J]。《中國特殊教育》(8), 65-72。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2021)。2020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108/t20210827_555004.html

王倩 & 李穎異 (2018)。衝突與和解:關係視閥下流動兒童媒介素養構建研究。《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 40(1), 163-168。

Bartau-Rojas, I., Aierbe-Barandiaran, A., & Oregui-González, E. (2018). Parental mediation of the Internet use of primary students: Beliefs, strategies and difficulties. *Comunicar. Media Education Research Journal*, 26(1), 71-79. <https://doi.org/10.3916/C54-2018-07>

Benedetto, L., & Ingrassia, M. (2021). Digital parenting: Raising and protecting children in media world. *Parenting: Studies by An Ecocultural and Transactional Perspective*, 127-148. <https://doi.org/10.5772/intechopen.92579>

Chang, F. C., Chiu, C. H., Chen, P. H., Chiang, J. T., Miao, N. F., Chuang, H. Y., & Liu, S. (2019). Children's use of mobile devices, smartphone addiction and parental mediation in Taiwa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93, 25-32.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8.11.048>

Chou, H. L., & Chou, C. (2019).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factors related to Taiwan teenagers' smart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using a random sample of parent-child dyad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99, 335-344.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9.05.032>

Correa, T. (2014). Bottom-up technology transmission within families: Exploring how youths influence their parents' digital media use with dyadic dat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4(1), 103-124. <https://doi.org/10.1111/jcom.12067>

De Morentin, J. I. M., Cortés, A., Medrano, C., & Apodaca, P. (2014). Internet use and parental mediation: A cross-cultural study. *Computers & Education, 70*, 212-221. <https://doi.org/10.1016/j.compedu.2013.07.036>

Fu, X., Liu, J., Liu, R. D., Ding, Y., Hong, W., & Jiang, S. (2020). The impact of parental active mediation on adolescent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07*, 106280. <https://doi.org/10.1016/j.chb.2020.106280>

Hefner, D., Knop, K., Schmitt, S., & Vorderer, P. (2019). Rules? Role model? Relationship? The impact of parents on their children's 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involvement. *Media Psychology, 22*(1), 82-108. <https://doi.org/10.1080/15213269.2018.1433544>

Kardefelt-Winther, D. (2015). A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internet addiction research: Towards a model of compensatory internet us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1*, 351-354.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3.10.059>

Ko, M., Choi, S., Yang, S., Lee, J., & Lee, U. (2015, September). FamiLync: Facilitating participatory parental mediation of adolescents' smartphone use.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15 ACM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Pervasive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 Osaka, Japan.

Lee, S. J., & Chae, Y. G. (2012). Balancing participation and risks in children's internet use: The role of internet literacy and parental mediation.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5*(5), 257-262.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11.0552>

Livingstone, S., & Haddon, L. (2008). Risky experiences for children online: Charting European research on children and the Internet. *Children & Society, 22*(4), 314-323. <https://doi.org/10.1111/j.1099-0860.2008.00157.x>

Lu, S., Lin, Y. T., Vikse, J. H., & Huang, C. C. (2016). Well-being of migrant and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Education, health, parenting, and personal valu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5*(1), 58-68. <https://doi.org/10.1111/ijsw.12162>

Meeus, A., Eggermont, S., & Beullens, K. (2019). Constantly connected: The role of parental mediation styles and self-regulation in pre-and early adolescents' problematic mobile device use.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5*(2), 119-147. <https://doi.org/10.1093/hcr/hqy015>

Nikken, P., & Jansz, J. (2014). Developing scales to measure parental mediation of

young children's internet use. *Learning, Media and Technology*, 39(2), 250–266. <https://doi.org/10.1080/17439884.2013.782038>

Top, N. (2016). Socio-demographic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monitoring of children in late childhood and adolescents' screen-based media use.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60(2), 195-212. <https://doi.org/10.1080/08838151.2016.1164168>

Warren, R. (2001). In words and deeds: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mediation of children's television viewing. *The 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1(4), 211-231. https://doi.org/10.1207/S15327698JFC0104_01